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满族小说与 中华文化

关纪新 著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满族小说与 中华文化

关纪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 / 关纪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5595 - 2

I. ①满… II. ①关… III. ①满族 - 小说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241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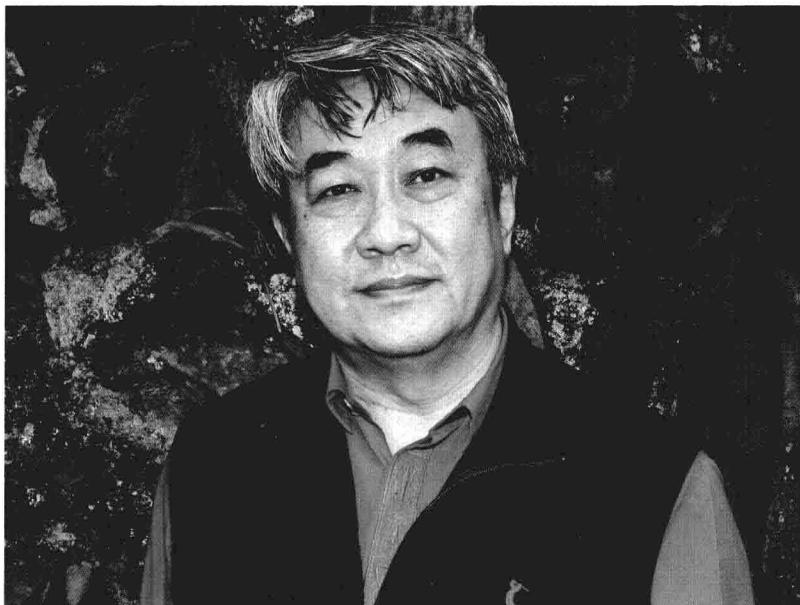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马续辉 周志宽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惠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薇 责任印制 / 岳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75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彩插印张 / 0.375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357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595 - 2
定 价 / 1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吴纪新 满族，1949年生，吉林伊通人。国内知名的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老舍研究家、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为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编审职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多种，其《老舍评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等著作在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参与编著的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当代满族作家论》《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逾百篇。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鉴定之“优秀”成果
(项目批准号: 06BZW074)

目 录

引言 满族历史文化鸟瞰	1
第一章 满族书面文学素描	23
第二章 满族小说创作述要	39
第三章 培植满族小说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	75
第四章 民族精神型范的艺术表达	97
第五章 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悲悯情怀	127
第六章 与汉族小说相异相辅的人物画廊	152
第七章 满族小说创作的语言特征	174
第八章 满族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诉求	205
第九章 满族小说的京城摹写与民俗扫描	230
第十章 满族小说的历史反思和精神文化启蒙意蕴	260
第十一章 中华文化大格局中的满族小说价值评估	288
结语	311
参考文献	317
索引	320
后记	323

Contents

Introduction Manchu History and Culture	/ 1
Chapter 1 Sketch of Manchu Written Literature	/ 23
Chapter 2 Summary of Manchu Novels' Creation	/ 39
Chapter 3 Ethnic Background and Folk Culture of Manchu Novels	/ 75
Chapter 4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Ethnic Spiritual Pattern	/ 97
Chapter 5 Sympathy Affection under Sedimentary Deposits of Historical Culture	/ 127
Chapter 6 Figure Gallery Different from Han Novels	/ 152
Chapter 7 Linguistic Characters of Manchu Novels	/ 174
Chapter 8 Manchu Novels' Artistic Appeal to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	/ 205
Chapter 9 Beijing Presentation and Folklore Narration of Manchu Novels	/ 230
Chapter 10 Connotation of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Enlighten Spirit of Manchu Novels	/ 260
Chapter 11 Evaluation of Manchu Novels in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 288
Conclusion	/ 311
Reference Documentation	/ 317
Index	/ 320
Epilogue	/ 323

引言

满族历史文化鸟瞰

满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中国特有的非跨境民族。

满族原本称作满洲，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明代中后期崛起于祖国东北白山黑水广袤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先世为肃慎人，是很早便见诸中国文献记载的东北亚地区古老民族。

据我国先秦文献《竹书纪年》载，远在传说中的虞舜时代，东北方向上的肃慎人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且将其擅长制作的弓矢等物品向内地纳贡。而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当中，也存有“肃慎、燕毫，吾北土也”的文字记录（昭公九年），同样证实了生存于北方的肃慎人，古来便与中原有着密切的关联。降至汉代的挹娄人，魏晋之间的勿吉人，隋唐时期的靺鞨人，以及辽、金、元、明诸代世间较为熟知的女真人，也都大致属于肃慎之后裔、满族之先民。

在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女真政权主宰之下的女真民族发生了一件大事：后金大汗皇太极正式颁布御旨，决定易原有族名“女真”为新的族名“满洲”。在随后出现的满洲民族共同体中，其主体依旧是先前的女真人，但同时也融合吸收了与女真民族共同生活的周边部分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成分。

“满族”的民族名称，其实是直到20世纪前中期才出现的一个对旧有满洲民族的简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开展国内民族识别认定工作过程中，“满族”的称谓得到了法定确认。

东北亚地区白山黑水之间的广袤地域，就气象学来看基本上属于寒温带，气候的突出特点便是冬季漫长高寒、夏季日照强烈。满族的先人们世代

生活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下，铸就了耐受严寒酷暑、不畏艰难困苦的坚忍的民族性情。当地除却冬日高寒、夏日酷暑之外，其他自然条件却又称得上是得天独厚的：山岭环抱，广原舒展，水网交织，林莽密布，实属有利于人类繁衍生息的较佳场域。特别是那里有着奔流交错的宽江疾河，以及到处都可以见到的一望无际的森林，更是天赐般地供给了人们取之不尽的生计之需。采集业、捕捞业与狩猎业，成为亘古以来满族先民依偎于大自然怀抱之中，获取生存资源与生命动力的有效途径。满族的先世，是久远传承的渔猎经济民族。到了明代的时候，最后一波的白山黑水女真人由牡丹江和黑龙江流域陆续南下，在进至当今的辽宁地区以后，一定程度上改习农耕，但祖祖辈辈最为熟悉的渔猎生涯，却给这个民族及其后代，灌注下了难以抹去的精神基因。

从满洲民族的早期初民起始，他们就笃奉着一种被称为“萨满教”的原始宗教。这是一种以“万物有灵”为基本理念的宗教，它要求人们特别关注自己与自然万物不容疏离的依存关系。满洲民族的成员十分虔诚地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他们单纯、质朴、大度、豪爽，普遍带着在原始自然经济传统下面生存所养成的群体意识与利他精神。满族的先民信奉萨满教历经了许多世纪，有关天地万物的神思遐想在该民族民众的心间扎下了深根，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我们知道，世界各地众多族群在其各自的早期生存期间，皆有过确切的原始宗教信仰，不过，由满族先民流传到后世的萨满教，却具备着高度的代表性及典型性。时至今天，国际上的文化人类学界凡是谈到人类的原始宗教信仰时，总是会提到东北亚区域满族先世的萨满教。

满洲民族的历史，也因为充满了起伏跌宕而引人普遍瞩目。

作为肃慎古族流脉之靺鞨族，其所属的重要分支粟末部，曾经融靺鞨族白山部的一部分，以及一些高丽遗民，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在今日的中国吉林及黑龙江南部一带，建立起了国力堪称强大的“海东盛国”——渤海国，其经济文化盛极一时，据史料记载，已可直追中原同时代的大唐王朝。

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2世纪初创建的金朝，立国120余年，曾经与南宋、西夏同时，在中国版图上鼎足而三。金朝疆域辽阔，东北方向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达今天的蒙古国，正西方向则以

河套、陕西横山及甘肃东部与西夏王朝接壤，南面以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在金代的世宗时期和章宗时期，金朝境内还出现了史家所夸赞的“盛世”气象。

由肃慎下续直到满洲出世，该民族各个时代历史性作为的次第展开，却并非是单线条的。“渤海国”政权解体以后，粟末靺鞨人陆续失散，一些成分甚至离开了女真群体，进入朝鲜半岛。而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先前不够发达的黑水靺鞨部，则成了金代女真的基本先民。金代结束以后，进入了燕京及中原地区的女真旧部，大多散落到了冀鲁豫一带，融入汉族中间，能够及时返回东北故土的不是很多。至于明代的女真人，又是后来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起来的先前发展相对落后的女真群体，这些人才是满族的直系先民。虽然“渤海国”之靺鞨人和金代之女真人，都没有整体成为满族直系先人，但是，“渤海国”和金代那些由肃慎民族不同后裔成分所创造的令世间瞩目的经济文化业绩，却相当充分地说明肃慎古族流脉具备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假如人们认为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代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曾经为肃慎古族另一流脉亦即明末崛起于辽东的女真—满洲族群，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终结之前横空出世，再度打造出来一段历史佳绩，埋下了其前定的伏笔，也许并不过分。东北亚地区的此一古老族脉，一向富有想象能力和自强自立精神，粗犷豪放又不惧艰难，敢于实践更善于承担，他们能在近似的历史境况下反复地卷土重来，进取，成功，其间一定存在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女真人，是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重新崛起的、原本处于相对蒙昧状态的女真人。他们在当时分批南下，逐步形成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在内的女真三大部。至万历年间，女真各个部落交相蜂起，所在区域战乱频仍，族内彼此残杀荼毒，令民众痛苦不堪。16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酋长努尔哈赤，顺应历史趋势与民心所向，兴兵举事，志在统一女真各部。在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两代人的率领下，经过数十载矢志不移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了周边的蒙古和朝鲜，击溃了明朝派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最终进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令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则宣布变更女真旧有族称为“满洲”，还把国号“金”变换为“清”。这

样，满洲上下不再刻意强调自己与金朝以及女真人的历史渊源关系，表达了比以往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精神姿态。

1644 年，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且迅即向全国各个方向推进，开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主宰中华帝国 267 年的进程。

清代满洲人被世间习惯性地称为“旗人”。其实，有清一代，“旗人”乃是对被编入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兵民一体化组织中全部成员的总称，而并不是单指满洲旗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为筹划进取中原，将满洲全体青壮年男性收进军队，把他们划入以八种不同旗帜为标志的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被称作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随着政治军事推进的需要，后来又仿照八旗满洲编制方式，建立起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这三个八旗共同构成的军事组织，在建立起的二三百年之间，为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体现了重要作用。至清代后期，世间称呼三个八旗所有成员约定俗成的叫法是“旗族”。

清代初年，兵民一体的八旗组织创建之际，正是满洲民族的精神上升期，发愤图强、争立勋业，是充盈于民族整体的核心价值追求。在满洲上下整合一心万难不辞的精神作用下，在 17 世纪的中华大地上，推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清王朝。这一新兴政权内成一统，外拒强敌，使先前已呈滑落颓势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一样地再造出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康雍乾盛世”，使人民大众获得了在安定富足条件下繁衍生息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全国的人口也从大约 7000 万猛增至 40000 万。可以说，没有满洲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代前期的勉力经营，进而达成清代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总体局面，日后的中国，是难以渡过东西方列强野蛮瓜分、妄图灭亡我文明古国这道险关的。

在清初百年上下平息反清势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入侵、扫灭准噶尔叛乱等战争中，八旗将士不断地被派往国内各个地方作战与驻防。到了乾隆后期，全国各地八旗驻防已经达到 130 多处。满洲人因而分布到了全国广大区域，除了北京作为满洲人和八旗军的大本营之外，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多地，也都分别设置了成建制的八旗驻防。清代是

中国有史以来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版图最为广阔的时期。中国当今的版图就是在清代大致确定的。^① 清初的百年，中国幅员极其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均能够切实地管理起来，其所辖版图数倍于前代之明王朝，国土面积已经达到 1250 万平方公里。

在有清一代的将近 300 年间，满洲将士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前仆后继地英勇参战，付出了后人难以想象的民族牺牲。除清代初年的战事，清中期还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重大战事；清后期又有两次反抗西方入侵的鸦片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在所有这些战事当中，满洲官兵壮烈殉国者层出不穷，史书上记载很多。

入关之后，满洲民族中又涌现了一批相当杰出的人物，多尔袞、孝庄皇太后、康熙、雍正、乾隆，都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战国策》中，有《触詟说赵太后》一文，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定规律，而满洲民族的领袖人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肇始，持续许多代奋发精进，显见地逸出了这一规律制约，不能不说这是历史上的特例与奇迹。此外，由八旗满洲群体当中走出来的良将、贤官以及方方面面的优秀代表人物，也不胜枚举。^②

八旗制度是伴随满洲的崛起而出现的，这一制度曾经塑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一个颇有作为的历史时代，维系了虽属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然而，其制度自身也孕育了难以调节的潜在危机。八旗制度是清代贯彻始终的一项政治制度，对旗人们的约束异常严苛，它把世世代代的旗人圈定在当兵征战靠吃粮饷为生的唯一人生范围里，禁止旗人及其家眷从事当兵之外的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任何其他生计，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也切实防止了旗人在社会生活当中与民争利，却造成了该制度创立者始料不及的难题。从雍正年间开始，“八旗生计”问题便显现端倪，之后更是愈演愈烈，统治者一直想要解决它，却终

^① 元朝的蒙古军团曾经在其鼎盛时代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占领过的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所以元代的中国在国家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地增加。清代则不然，其前期在征讨周边地域的过程中，贯彻了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得一地，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使版图所有真正有效化。

^② 可参阅《清代八旗贤官》（滕绍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等史学著作。

告无力。这是因为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①，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和平年代，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日益增多，却不能不眼睁睁地失业赋闲于家中，成了既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经济收入的“闲散旗人”，于是不单导致了下层旗人家庭越来越明显地贫困化^②，还致使先前精锐强大的八旗劲旅，在非战岁月渐渐滋生了远离劳作、荒于嬉戏的种种弊端。正是八旗制度本身，给奉行这一制度的满洲族群最终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在生存的贫困线上压抑苦熬的生活，上演了一代又一代。而更令人悲哀的是，至辛亥年之后，一向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的满洲人，突然被断绝了世袭军人所得到的经济来源，当时整个社会的舆论与环境又都对他们十分不利，八旗制度管辖之下的末代旗族百姓，便比他们的先人们要加倍地承担这种历史制度所生发的惩罚与报应。有人说，满族的历史是“成也八旗制，亡也八旗制”，不能讲没有道理。

八旗制度的约束，也对满洲文化的演变产生着作用。这一制度将先后十数代的旗人们始终圈定在兵民一体的人生轨道上，既造成了旗族下层生存质量的恶化，八旗子弟们在心灵上的憋闷抑郁也不难想象。贫困苦难的下层旗人，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代，也要被死死地禁锢在他们的驻防地域里面。就连旗人高层，哪怕贵为王爷贝勒，尽管享受着锦衣玉食，可以养尊处优，却也依例要与普通旗人一样，没有人身自由。清朝制度规定，不在京城之外设置分封定居的宗室外藩王，即便身为王爷贝勒，如若没有得到差遣，照样不可以擅自离开京师，也只好在这座城池里头当他一生的富贵“囚徒”。浸泡于这种人生悲剧当中，旗人上上下下的心绪皆不得舒展。为了逃脱落寞人生的暗影笼罩，他们只能变换方式来调剂自己的生活和心理。长此下来，旗族内部便出现了追求艺术情趣的趋势，他们得借以寻找哪怕是些许的慰藉和平

① 《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9页。

② 清军入关之际，因军事需要，满人男性16—60岁（或者身高5尺以上）者，均须应征入伍，成为甲兵。按照八旗制度规定，被挑为甲兵的旗人可按月领饷。饷分为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统称为“钱粮”。而钱粮是只发放给甲兵的，未经挑甲的闲散旗人以及妇女是没有饷的，他们只能靠家中被挑上甲丁的旗兵的钱粮来养活。而愈到清代的中后期，下层旗人家庭中不能被挑上甲丁的闲散旗人愈多，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便愈发地严重。

衡。在以艺术手段来调节生活上面，花时间花力气，逐步养成了整个民族倾向都市生活情趣的艺术嗜好。随后，全民族（尤其是京师驻防旗人们）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差不多近似于脱缰野马，把一个原本饱含尚武精魂的民族，渐渐就改造成了文化气息浓烈的社会群体。在清代的中晚期，满洲人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有了深入的造诣，连他们的日常口语以及风俗民情，也都被打点得处处艺术化了。与此同时，满人们的性情气质，也由奔放粗犷向优雅细腻转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止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而且由于具体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权，它便增加了一重固有的意义，即推倒了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满洲人——对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封建时代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的必然。不过，其最终的王朝偏偏赶上的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却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而这点偶然性却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当大的忙。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帝制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间，“忠君”与“爱国”从来就被混为一谈，各个阶层普遍缺失反封建的精神理念，欲动员民众来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显然殊非易事。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显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不难看出的。光绪年间，连以康、梁等人为代表的保皇党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难以实现，想要用革命方式一举瓦解帝制，其困难程度就更是可以想到。然而，使这样一道难题得以突破的“捷径”终于被找到，这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的皇帝原本来自国家主体民族汉族之外的异民族，而“尊王攘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却是华夏民族传统的正宗思想版本。在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度，做一番鼓动大民族民众合力推倒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比号召和说服民众向封建王朝造反，则会方便得多。更何况“大清朝”此刻已然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西方列强四面进逼，更让这个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呈现出了“残灯末庙”的种种症候；加之有“八旗生计”的多年困扰，旗族生活落寞消沉，酿就了一部分八旗将士的精神蜕变乃至心理异化，也为否定旗族提供了依凭。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一经提出，人们大多是较为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往往都把更为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

个字丢到脑后。这种带有偏颇的思想策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广泛呼应。于是乎，“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羸弱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顷刻便息影于世间。

辛亥鼎革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的思想界，以往多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上，去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革命的结局只是在形式上了结了封建政权的存在，却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这固然应称的论，但是仍然是不够的。假如我们从民族关系处理这一层面来看问题，辛亥革命同样有着其没能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留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国，不同起源不同传统的各个族群曾经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弘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一翻中华史册，人们就会注意到，由于各个时期各个族群之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确实出现过彼此间的矛盾、冲突，甚至还有一些规模化的战争；但是，假如人们今天可以站得更高些，心胸放得更开阔些，则不难看到，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比起相互的太平厮守，则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应当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大历史的一个基本主题。再以清朝入主中原后形成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空前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地位及持有的价值理念有明显的差异，起初不可避免地有过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然而，如果从将近 300 年的全部清史来判断，清代仍然可以被认定为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满、汉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都是比较和谐的。^①

^①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之际，清军南下曾遇到南明政权在某些局部的殊死反抗，一度矛盾相当尖锐，造成了少数城池的激烈争夺以及随后出现的屠杀。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民族冲突关头所坚持的传统民族气节是值得称颂的。不过，这些抗清志士在自己恪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新政权效力的同时，却大多勉励未曾出仕于明季的子弟们准备应试于清廷科举，似乎他们并未十分决绝地对抗异民族的新政权。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及满族帝王们对儒家文化的由衷尊重与认同，中原旧族普遍出现了拥戴时政争相服务的举动，并将这种态度坚持到了清末。有清一代的確实行过“首崇满洲”的政策，但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种种方式，并没有超越封建时代中外任何一个民族政权（无论是大民族主政抑或是小民族主政）的作为底线。满洲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观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比较有利于境内各个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为了安抚汉族地主阶级，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政策，例如严禁八旗将士务工务农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开设科考大量录用汉族贤才等。至清代中晚期，汉族封建阶级的势力在整个权力结构中间的比重持续上升，满汉两族的原有矛盾已有了显见的淡化。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①，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推翻封建王朝舆论造势之际，某些历史真相被舍弃。推翻满人做皇帝的清政权既然成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地株连满洲整个民族便属正常；不单满汉两个民族长久以来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历史真相被人为地遮盖起来，满洲民族为中华帝国开疆拓土、保国护民慷慨奉献的大量事实也均被忽略，满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以至于妖魔化。为了发动造势上的便利，两个半世纪之前满洲民族入主中原被指为一切罪恶的源头，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②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③等理论就此交注合流，把满族人一概诬为“满洲贱族”^④“逆胡擅虏”^⑤“满洲鞑子”^⑥“野番”^⑦的辱骂诋毁亦很普遍，就连正规的政论也同样喊出了“兴汉复仇”^⑧“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⑨。一应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的策动种族之间无情仇杀的言辞，在革命发动者口边震响，也在社会现实中奏效，其结果，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的策应，某些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更是通力施展，鼎革大势就此告成。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⑩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言论，历史学界注意到：“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② 转引自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③ 余一：《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④ 章太炎：《客帝匡谬》，载《訄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⑤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载《章太炎诗文选》，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06页。

^⑥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⑦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 孙中山：《1900年10月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页。

^⑨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⑩ 转引自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